

# 新的综合：社会学理论的当前趋势

谢立中

近些年来，西方理论社会学界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各个传统流派的社会学家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试图打破原来的理论疆界，“理论综合”重新成为学者们心往神驰的一个奋斗目标。在9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瑞泽尔曾明确地指出：“进入90年代以来，社会学理论中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发展就是逐步远离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进入理论综合的方向。那些旧的统治了社会学理论许多年的具体标签（如‘结构功能主义’、‘符号互动论’）其意义和重要性似乎正在日益变小。由于年轻一代的社会学家占据了中心舞台，较老的理论 and 概念（如微观—宏观）之间的界限正在崩溃，一些年轻的理论家们甚至在扮演一种积极的角色以期摧毁那些疆界。各种理论当前的支持者很少有兴趣去保卫对他们的理论所做的传统解释，而是以极大的兴趣去向其它的理论传统伸展，以努力发展出一种新的更为综合性的理论。”<sup>①</sup>他欢呼社会学理论正在进入一个“特别吉祥的年代。”另一位当代著名的理论社会学家J·亚力山大也明确地断定：西方社会学理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对过去分离的理论传统重新进行大综合的阶段。<sup>②</sup>

在西方社会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理论综合的先例。其中最有影响的综合之一是早年帕森斯对迪尔凯姆、韦伯等人的综合。通过对理论先驱们的综合，帕森斯创造了一个宏伟的“巨型理论”。这个宏大的“巨型理论”曾经在西方社会学界雄霸一时，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与这种以创造一个单一的主宰性理论为结局的“一元综合”模式不同，当前西方的大多数社会学家对正在出现的综合活动可以说是采取了一种更为宽容的“多元综合”的态度。仍用瑞泽尔的话来说：“尽管（社会学家们）对综合有着一种巨大的兴趣，但似乎也存在着一一种认识：即那些试图创造一个单一的中心性的综合理论的努力，是一种失误。……当前在理论综合方面所做的努力是更为有限的和有约束性的。”<sup>③</sup>因此，瑞泽尔认为我们与其把当前正在出现“新综合”称为“a new synthesis”，不如称为“a new syntheses”。<sup>④</sup>

确切说来，当前在西方理论社会学界各个传统流派之间出现的综合活动是一种“综而不合”的过程。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系列“综合性”的理论。这些理论都试图在“坚持”原有某个理论传统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突破原有传统的某些教条主义框框，“批判性”地接受其它一些理论传统的思想与观点，以发展自己的理论传统，使之成为一个更为综合的理论。因此，这些理论大多都自称为或被称为“新……”理论或“后……”理论。以下择其要简介之<sup>⑤</sup>。

①C·瑞泽尔，《社会学理论的当前状况：新的综合》，载《社会理论的前沿：新的综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②J·亚历山大和P·柯罗密，《今日新功能主义：重建一种理论传统》，同上书，第36页。

③④同①第2页。

⑤建立“综合理论”的活动，不仅是发生在原来的各个理论传统之内，而且也发生在这些传统之外。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发生在原有各个理论传统之内的综合活动作一简略介绍。

## 1. “新功能主义”理论

“新功能主义”是当前美国理论社会学界来势最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其主要提倡者有J·亚历山大、P·柯罗密、蒙奇、卢曼等。

“新功能主义”这个词明确地表达了它与传统功能主义（尤其是结构功能主义）的继承关系。按照它最积极的提倡者J·亚历山大的说法，他们之所以采用了“新功能主义”这个提法，是为了表明只有“帕森斯的分析模式为（社会学理论的）一种新综合提供了唯一可行的基础。”<sup>⑥</sup>为了表明这种看法的合理性，亚历山大对帕森斯的理论重新进行了解释。按照他的看法，“功能主义对于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来说从来不是一个十分贴切的称号。”<sup>⑦</sup>实际上，帕森斯的著作（尤其是其早期著作）体现了一种宏大的企图，即对实证主义、功利主义、功能主义、唯意志主义、帕累托主义等古典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归纳与综合。因此，帕森斯理论的内容是异常丰富的，但同时也因而是“非常模糊的并常常是自相矛盾的”。<sup>⑧</sup>它“给予社会学家们许多不同的选择，他们基于自己的知识和历史条件而从中做出各自的选择。”<sup>⑨</sup>那种导致其衰退的对它的解释——“反个人主义、反对变迁、保守主义、唯心主义及反经验主义的偏见等”，正是在60—70年代特定的知识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学术界对帕森斯理论所进行的选择性诠释的结果。亚历山大认为，在新的知识背景与历史条件下，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作出新的解释和发现。在1985年他所撰的《论新功能主义》一文中，亚历山大描述了他自己对“功能主义传统”的重新解释。按照这种新解释，“功能主义传统”由以下六个特征构成：（1）功能主义在描述性而非说明性的意义上提供了一种社会各部分间相互关系的一般图景，它认为社会是由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各要素所组成的、多元的与开放的系统；（2）功能主义像关注结构那样关注行动，而且不仅关注行动的实践性与手段性方面，而且也关注它的表意性与目的方面；（3）功能主义关注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的变异及过程；（4）功能主义假定人格、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区别是社会结构所必需，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所产生的张力是变迁与控制的持续根源；（5）功能主义认为分化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6）功能主义强调概念化与理论化的独立性。这些特征表明，功能主义并不像人们惯常认为的那样只重宏观不重微观、只重整合不重冲突、只重客观不重主观、只重稳定不重变异。因此，它完全“具有成为一种成功的社会学理论所需要的基本素质”，<sup>⑩</sup>是新综合的最合适的基础。

亚历山大强调指出，“新功能主义”之所以是“新”功能主义，表明了它并不仅仅是要想复活“老”的功能主义。“引进‘新功能主义’这个词是为了强调继承性和内部批判这双重要素。”<sup>⑪</sup>正如“新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机械性缺点和吸收20世纪社会思想最重要的进步成果的基础上重建了马克思主义一样，新功能主义也是要在一方面对老功能主义的一些缺陷进行内部批判，另一方面充分吸收60—80年代间产生的许多新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重建”功能主义。亚历山大、柯罗密等人指出和批判了帕森斯理论中的一些缺陷，如思想上的矛盾、前后不完全一致等。他们认为后期帕森斯的著作确实逐步向系统、整

⑥同②，第40页。

⑦⑧⑨J·亚历山大，《论新功能主义》，《国外社会学》，1991年第3期，第1、3页。

⑩同⑦，第3页。

⑪同②，第34页。



合、文化、均衡等维度倾斜，偏离了他早期的“综合精神”（亚历山大认为帕森斯的重要贡献不是他的结构功能主义，而是他早期对“多维性”的强调）。在此基础上，亚历山大等人强调要使功能主义向冲突理论、互动理论、交换理论等理论传统开放，把它们的基本思想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例如，为了能把冲突论思想综合进功能主义，亚历山大批评了帕森斯关于系统总是趋向于均衡的观点，指出系统不必然是均衡的，并且强调在帕森斯的著作中，尤其是关于分化过程产生不均衡的思想中，本来就包含着大量关于社会冲突的命题；为了把行动的偶然性与创造性思想引入功能主义，亚历山大强调要在功能主义范围内综合米德、戈夫曼以及舒茨、早期加芬克尔等人的思想；为了把“批判理论”及其它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导入功能主义，纠正帕森斯对现代社会过分乐观的观念，亚历山大强调要去发现帕森斯思想中具有批判性的一面。除了亚历山大之外，其他一些新功能主义理论家也致力于重新发现或“重建”帕森斯功能主义的冲突取向、互动取向、批判取向和变迁取向等，力图在坚持功能主义上述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总结吸收其它理论传统的思想，使这些思想最终以一种功能主义的方式被结合起来。

目前，新功能主义已不仅是一种理论层次上的综合活动，而且已经出现在经验研究层次上。但总得说来，新功能主义还是一个尚未完成的理论运动，它只是体现了一个新的理论方向。在许多具体理论问题上，新功能主义者们也还并未获得一种共识或主导性认识。新功能主义承诺要实现一种新的综合，但它能否达到这个目标，却只有通过时间来加以判定。瑞泽尔下面的这段话，也许表达了许多学者的心情：“亚历山大和柯罗密明确地为新功能主义定下了如此雄心勃勃的目标。我们将不得不等待，看看新功能主义是否能达到这个目标，或者是否即使是仅仅通过复活结构功能主义来达到这个更现代的目标。”<sup>⑫</sup>

## 2. 新社会冲突理论

当代社会冲突理论是达伦多夫等人在50—60年代作为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对立物而提倡起来的。达伦多夫等人的社会冲突理论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在社会实质、社会结构、社会变迁观等方面强调与结构功能主义的截然对立，二是在研究层面上与结构功能主义一样是停留在宏观层次上，并且也带有浓厚的结构决定论色彩（强调冲突源于社会结构，是个人对既定结构的反应）。一句话，社会冲突理论起初也是一种片面的或一维性的理论。

自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以来，社会冲突理论的这种一维性倾向也开始得到纠正。它的提倡者开始主张并实行向其它理论传统开放，主张吸收其它理论传统（包括结构功能主义）的思想成果，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以冲突理论为核心的综合性一般社会理论。这种努力方向的最积极、最自觉的实行者和推动者，主要是柯林斯等人。

与新功能主义者相似，柯林斯也认为冲突理论是目前最为开放的、“与当前大多数社会学理论纲要相比有着更广泛视野”的理论，因此应当以冲突理论为基础来进行当前的理论综合活动。<sup>⑬</sup>柯林斯也试图澄清人们对“冲突理论”的传统感觉，强调不能把冲突理论仅仅理解为是关于“冲突”的理论。他说：“在一定的意义上，‘冲突理论’这个词是某种程度的用词不当。它并不简单的只是一种关于冲突的理论。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它是一种关于社会

<sup>⑫</sup>同①，第6页。

<sup>⑬</sup>柯林斯，《冲突理论与宏观历史社会学的进步》，载《社会理论的前沿：新的综合》，第72、70页。

组织、关于个人与群体行为的理论，它解释结构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如在特定的情境下一样）采取了它们所采用的那些形式，以及哪种类型的变革会和怎样发生。因此，‘冲突理论’比专门的关于冲突的理论有着更广泛得多的领域”；“冲突理论是一种面向整个社会学领域的一般理论”。<sup>⑭</sup>柯林斯认为作为一般理论的冲突理论其核心思想由以下几点组成：

（1）社会组织中心特征是社会分层、个人与群体之间不平等的种类与程度，以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2）社会事件的原因应从个人与群体的利益（首先是他们维持既定的统治地位或逃避被统治地位的利益）中寻找；（3）在那些斗争中谁将获胜，取决于不同集团所控制的资源，既包括用于暴力和经济交换的物质资源，也包括用于社会组织和用于形成情感与观念的那些资源；（4）社会变迁是特别的为冲突所推动<sup>⑮</sup>。柯林斯认为，只要不改变这些基本特征，一般冲突理论就可以而且已经吸收所有其它各种理论流派的概念与思想：“冲突理论……忙于自由地进行某种可称为‘知识的非法盗用’的活动。它非常乐意与那些能为理解人类认知、情感与行为而确立一种综合模式提供良好基础的部门（如微观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唯一的标准是那些借用必须是有能力维持这样一种社会结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权力和财产、统治与斗争是核心的特征”。<sup>⑯</sup>

基于这种认识，柯林斯从80年代以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致力于把交换论、互动论、戈夫曼的拟剧理论等微观社会学的理论思想结合到冲突理论模式中去，力图为冲突理论建立一个微观理论基础，在冲突理论范围内实现微观、宏观理论的结合。柯林斯说他“尤其试图表明社会分层与社会组织是建基于日常生活的互动之中”。<sup>⑰</sup>他认为需要从日常生活互动中为其确立基础的最重要的现象有二：一是“对抗、统治与冲突的形式”，二是“把群体联结在一起的团结的形式”<sup>⑱</sup>（柯林斯由此把功能主义的基本主题吸收进了冲突理论）。他认为这两种现象都可以通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互动过程而得到更好的理解。而在对日常互动的过程的理解上，柯林斯又把交换论、符号互动论、拟剧论等理论融合在一起。他把社会生活看成拥有不同资源（物质、文化与组织等资源）的个体间持续不断的谈判与交换过程。但他指出单纯的交换理论有很多弱点，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的互动过程，必须用符号互动论等来加以补充、修正。柯林斯十分欣赏戈夫曼关于日常互动仪式的分析，认为冲突与团结这两方面的现实都可以通过戈夫曼的互动仪式模式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更好的说明：一方面，在日常生活的命令发布与命令接受的过程中，前台与后台的人会产生相反的动机类型和意识类型，由此导致阶级对抗与冲突；另一方面，通过地位平等的仪式性社交，又会在互动者之间产生出团结一致感等等，从而使社会结构稳定。<sup>⑲</sup>

柯林斯还提出，仪式化的日常互动构成社会生活的基本成份，通过仪式化的互动在时间上的延伸，数量上的增大，空间上的拓展，就导致了宏观社会现象（包括宏观冲突与团结、宏观物质交换与符号交往等）的产生。柯林斯试图由此构筑起一个更为开放、更为综合的一般冲突理论。

在最近的著作中，柯林斯试图进一步把网络理论吸收到一般冲突理论中来，试图以网络理论为工具更精致地表达和发展一般冲突理论的思想。通过引进和发展历史社会学家米歇尔

<sup>⑭</sup>同上，第70页。

<sup>⑮⑯</sup>同<sup>⑬</sup>，第68、72页。

<sup>⑰⑱</sup>同<sup>⑬</sup>，第72页。

<sup>⑲</sup>参阅柯林斯，《理论社会学》，圣迭戈，学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365—366页。



·曼的著作《社会权力的来源》中的思想，柯林斯主张把社会结构表述为四种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网络：地理政治—军事网络、政治网络、经济网络和文化—意识形态网络。通过把社会（无论微观与宏观层次）看作是由上述四种网络组成的网络结构，冲突理论就可以借用网络理论的一系列概念与工具来进一步探讨社会的结构与冲突、微观与宏观、物质层面与符号层面等各方面的现象与关系。柯林斯对建立一种以一般冲突理论为基础的综合理论满怀信心，认为它必将“日益增进我们对整个社会学领域的理解。”<sup>②</sup>

### 3. “后布鲁默主义时代”的符号互动论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似乎没有人比符号互动论者那样更执著于把研究范围限制在微观现实领域内了。然而80年代后期以来，即使像符号互动论这样一种一直拒斥宏观研究的理论传统也日益变得开放起来了。像新功能主义者企图“重建”帕森斯的理论一样，80年代以来的符号互动论者们也力图“重建”布鲁默的思想；与新功能主义者把新功能主义称之为“后帕森斯主义时代”的功能主义相似，这些力图“重建布鲁默思想的人也把符号互动论发展的这个阶段称之为符号互动论的“后布鲁默主义时代”。<sup>③</sup>在当前的一些有关符号互动论的文章中，许多著名的互动主义者对布鲁默的知识贡献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不少人如迈恩斯（Maines）、威尔曼（Wellman）、塔克（Tucker）等试图在自己的文章中把布鲁默作为一个对社会结构和宏观社会学主题有着巨大兴趣的形象而“重建”起来，试图以此来扩大符号互动论的研究对象与适用领域，使之成为一种能与新功能主义等理论继续竞争的类似的综合性一般社会理论。

符号互动论者以前曾有过“狭隘主义”的不良名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80年代以来的符号互动论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分支：B·施瓦茨（B. Schwartz）、E·戈夫曼（E. Goffman）倡导的迪尔凯姆主义的互动主义，E·齐鲁巴威尔（E. Zerubavel）、J·汪德尔（J. Wanderer）倡导的齐美尔主义的互动主义，H·哈非克姆波（H. Haferkamp）、M·特鲁齐（M. Truzzi）倡导的韦伯主义的互动主义、C·沃尔夫（C. Wolf）、D·阿什利（D. Ashley）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互动主义，N·登辛（N. Denzin）、G·欣克尔（G. Hinkle）倡导的后现代主义的互动主义，A·弗兰克（A. Frank）、E·罗彻伯格—赫尔顿（E. Rochberg-Halton）倡导的现象学的互动主义，P·克罗夫（P. Clough）倡导的女权主义的互动主义，以及J·鲍德温（J. Baldwin）倡导的行为主义的互动主义等等。但这些不同的分支似乎都有一个相似的倾向，即试图用互动主义的概念与理论来处理、解释传统上只为其它宏观社会学流派所处理的那些问题，“存在于（这些）互动论者著作中的一个共同线索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互动论者有能力论述宏观社会学的各种主题。”<sup>④</sup> G·阿兰·芬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曾引证互动论者在其六个传统研究领域中的最新发展动态，来具体地说明符号互动论者力图把宏观社会学主题结合进来的上述趋势。这六个传统领域是：（1）自我与个性理论；（2）戏剧化、审视与自我呈现；（3）集体行为与集体行动；（4）文化与艺术；（5）社会语言学理论；（6）社会问题理论。

在自我与个性研究方面，互动论者正在将其与两种视野结合起来。一是与情感研究相

<sup>②</sup>柯林斯，《冲突理论与宏观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见《社会理论的前沿：新的综合》，第85页。

<sup>③</sup>G·A·芬，《后布鲁默主义时代的符号互动论》，载《社会理论的前沿：新的综合》，第117页。

<sup>④</sup>同上书，第120页。

结合，自我将不仅仅表现为一个“认知”的自我，而且也是一个充满情感自我。二是与组织社会学相结合，自我将被视为由它们所“嵌入”的组织与机构（包括家庭、学校、教堂和工作场所等）所引导。我们将不再处理抽象的自我与个性，因为那些自我与个性必然地存在于结构性的设置当中。因此，自我理论将逐渐失去其社会心理学的色彩，而日益进入宏观社会学的领域。

在拟剧理论研究领域，原被戈夫曼提出来主要用于分析个体行为的许多概念如审核、框架、自我呈现等，正在逐渐地被运用来说明更为结构化的行动者的行动，如代表集体行动的行动者的行动，“审核(和自我呈现)框架能揭示那些以集体名义说话的行动者的角色。”<sup>②</sup>

在集体行为与集体行动研究领域，互动理论家们正在用自己的著作力图表明互动论能比其它理论更好地说明被认为是“非理性”的集体行为，并由此进一步说明互动论者不是宏观社会学的反对者。

在文化与艺术研究领域，互动论者也显示了对“结构”因素的巨大热情。克罗夫认为布鲁默后期的著作表明他已认识到“符号世界的社会组织”（如电影等）的重要性。80年代以来的符号互动论者对文化、艺术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考察“艺术世界”或“文化生产”的结构特征。“艺术世界”或“文化”被视为一种特定的社会世界，因此可以像分析工业世界那样来分析它们（分析它们的行为的组织特征、生产的形式与制度的结构等）。

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则有大量互动论者的著作讨论了社会结构对语言这种“意义的首要形式”的影响。如齐默尔曼探讨了权力与权威如何影响语言的使用，他和威斯特发现谈话过程受到谈话者社会位置等结构因素的影响。莱克威斯（Likewise）也声称交谈结构直接为权威所控制和引导。波登（D. Boden）提出是交谈构造了社会组织。G·芬认为社会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将围绕着微观—宏观联结问题而进行，互动论者关于谈话是社会结构的“胶泥”的思想将进一步得到拓展。

在社会问题研究领域，有兴趣于此的互动论者也企图在更宏观的层次上来阐述社会问题。与其先辈相比，他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大企业、劳动者和政府之类的社会行动者身上，考察“结构性贫困”、失业、军事扩张等结构性的社会问题，试图探讨这些宏观性社会问题“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

总之，与新功能主义、新冲突理论一样，“后布鲁默主义时代”的符号互动论者们也正在日益寻求与其它理论传统（包括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互动论者认为他们在共同强调文化对社会结构的重要性这一点上可以沟通起来）的结合，尤其是与宏观社会学理论的结合。通过这种结合，互动论者也力求在未来的社会学领域中继续占居一席之地。

#### 4. 新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最初是霍曼斯为了克服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过分执著于宏观现实的偏狭而提出来的。但从产生之初，它就蕴含着两个重大缺陷：一是“矫枉过甚”，把宏观现实还原为微观的个人交换行为，不能有效地解释宏观现实的独特性质；二是微观解释中的过分实证主义色彩，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一样，仍然是把个人简单地视作完全由结构控制的机械行动者。社会交换理论的这两个重大缺陷（当然也还有其它缺陷，但以此两点为甚）一直受到

<sup>②</sup>同上书，第125页。



来自宏、微两大社会学领域的学者的攻击。克服这两个缺陷一直成为社会交换理论家（如布劳、艾默生等）努力的方向。

在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来实现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的联结方面，P·布劳曾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但他却轻易地放弃了自己在这方面的的工作，转向了宏观结构主义的理论立场。这似乎一直使交换理论家们感到遗憾。布劳之后，艾默生成为这方面最杰出的理论家。他提出的网络交换理论，被看作是在解决宏观—微观联结方面最有潜力的交换理论。80年代以来的社会交换理论，首先就是由艾默生的学生库克等人沿着艾开创的上述方向进一步发展的。

库克等人在较近的一篇文章中，<sup>②</sup>指出交换理论家的著作一直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微观层次上关注作为交换的社会行为，二是在宏观层次上关注作为交换的社会结构。这表明交换理论在作为沟通宏观社会分析与微观社会分析的桥梁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库克还提出了交换理论当前的三个发展趋势：一是交换理论正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田野调查之中，尤其是涉及宏观社会现象的一些调查研究之中，如对家庭、组织、社区以及宏观政治方面的一些调查研究。这从方法论上对长期以文献研究为主要手段的社会交换理论作了重要补充。二是交换理论的研究重点逐步从“两人交换”转向范围更大的交换网络。三是交换理论家们正在明确地试图把交换理论及其研究与当前“结构社会学”的发展在更广阔的范围上联结起来。库克等人认为，通过上述努力，使得社会交换理论在联结微观社会分析和宏观社会分析方面比其它理论能够具有更大的优势。

除了上述力图使社会交换理论更加结构化、宏观化的努力之外，交换理论家们还试图把符号互动论的思想结合到自己的理论中来，以克服自身具有的过分决定论的缺陷。“例如，当似乎存在着一种更好的选择时，一个行动者却可能选择留在一种长期固定的交换关系中。‘承诺’作为一种理性的策略在经济理论与交换理论中都得到了详尽阐述。然而，那些理论却不能充分解释行动者是怎样把他们的意图传递给另一人的，而这在理解信任与承诺是怎样成为交换关系的一个有意义的方面来说是特别重要的。”<sup>③</sup>原有的交换理论不适于解释这些问题，而符号互动论在这方面却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概念与思想。一个更好的交换理论有必要把符号互动论的这些思想吸收进来，使自己的解释力更加强大。<sup>④</sup>

通过上述努力，交换理论家们认为，他们已经发展出并且正在完善着一个比以往的交换理论更为综合的理论框架。他们和上述几个传统的理论家们一样，呼吁进行一种“更为综合的和一体化的努力”<sup>⑤</sup>来保护各种社会学理论已经获得的成果，使它们不致因社会学家们对建立和维持那些分离的“社会学领域”的过分关心而逐渐丧失。他们认为，在这方面，交换理论有着更大的潜力：“交换理论，首先由于它对社会互动、制度和结构的独特的呈现方式，为理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动态的概念框架，为理解结构与过程之间的结合机制提供了一个蓝图”，“这个理论框架，以它对更为透彻地理解结构与过程所做的允诺，为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提供了一个更为完全的呈现。”<sup>⑥</sup>交换理论家们对自己的未来似乎也充满了信心。

<sup>②</sup>K·库克等，《交换理论：结构与过程的一个蓝本》，见《社会理论的前沿：新的综合》，第158—177页。

<sup>③④</sup>同上书，第170页。

<sup>⑤⑥</sup>同上书，第176页。

## 5. 简要的评论

综上所述，自80年代中期始，西方理论社会学似乎进入了一个与以往的20余年性质完全不同的年代。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似乎不再是千军万马闹“独立”的纷争场面，而是一幅万众一心奔“综合”的热闹图景。各个理论传统（无论是功能主义，还是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等）的代表人物，都纷纷指陈继续分裂给理论社会学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同声呼吁并切实着手实现理论上的“大综合”。其结果是在西方理论社会学界促成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态势，即相互分离的各种理论流派之间相互渗透、竞相接近的态势。与以往各个学派之间固守疆界、互不沟通的局面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如果说以往单凭论题即可大致判断出一篇论著、一个学者的学派归属的话，那么现在这几乎是不可能了。

然而，这只是我们前面简单勾勒的素描图画的一个方面。变换一下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即可印证与此不同的另一种感觉，即：尽管各个理论传统的新秀们都在极力呼唤实现理论的“大综合”，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多少迹象表明这些呼唤者们有谁愿意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他人实现平等的结合（在这种平等的结合中，各种以往的理论传统没有优劣主次之分，每种理论都能在新的体系中获得自己合适的位置）。各个传统流派之间现有的各种综合活动，与其笼统地称之为“相互综合”，不如确切地称之为“综而不合”。倘若要问这种“综而不合”的局面是否具有某种合理性呢？它是否也就将是这场“世界大战”的最终结局呢？现在来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也许还为时过早。不过，瑞泽尔似乎已经为我们暗示了一种答案。如前所述，他认为学者们中已经“存在着一种认识：即那些试图创造一个单一的中心性的综合理论的努力，是一种失误。”如此来说，“a new syntheses”（而非“a new synthesis”）就不仅仅是对“新综合”活动当前状态的一种描述，而且也是对其最终结局的一种断定和期望。然而，J·特纳也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他主张社会学的各种传统理论应在平等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单一的综合，尽管在目前要达到这个目的尚为时过早，因为这些理论本身目前尚未完全发展成熟（因而我们目前还只能满足于对它们进行有限的综合）。<sup>②</sup>瑞泽尔和特纳的看法孰是孰非，我们很难作出一个唯一性的判断。让我们各自作出自己喜爱的选择吧。

<sup>②</sup>参阅J·特纳，《走向理论的综合》，见《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加利福尼亚，华兹沃斯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585—591页；《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去，现在与未来》，载《社会理论的前沿：新的综合》，第371—391页。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霍桂桓



# 社会学理论的分裂与统一

盛少波

许多科学领域的发展史表明，科学的进步有赖于新的、更富有综合性的理论的创立。经由新的、更富综合性的理论，先前那些相互对立的理论作为特殊的或局部的理论得到统一，原先那些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也就能得到科学的解释。同样，社会学的进步也离不开新的综合理论的建立。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诞生150多年以来，曾经历过几分几合的发展阶段，然而至今为止未能发展出一种统一的理论，而是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理论流派。据估计，在当代西方社会学中，大大小小的理论流派足有四、五十种之多，形成了“彼此对立”、“多元散乱”、“群龙无首”的局面，以至于被美国社会学家F·林德讥之为：“充斥着各种理论主题和方法论旋律的，没有统一节奏、次序和形式的噪音”。<sup>①</sup>面对这一状况，几乎每个关心社会学发展的理论工作者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分裂的根源何在？分裂的理论能否走向统一？如果能，统一的基础是什么？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提出一些尚不成熟的看法。

## 一、社会学理论分裂的根源

任何社会学理论都依赖于某种关于人和社会性质的假设，正如古尔德纳在《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中所指出的：“无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了解还是不了解，社会学家都要根据预先确定的假设来组织自己的研究，社会学的特点就依赖于这些假设，并随这些假设的变化而变化。要探讨社会学的特点，要了解社会学是什么，就要求我们去辨认那更深一层的关于人和社会的假设。”<sup>②</sup>正是这些假设的不同，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理论观点得以建立于其上的基础，也正是这些假设的对立，造成了社会学理论的分裂。

自社会学诞生以来，一直就有两种对立的关于人和社会的假设影响着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在关于人的性质上，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两种假设的对立。在前一假设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服从于支配自然界的因果规律，其行为是对外部客观结构或环境刺激的直接反应；在后一假设中，人被看作是独一无二的有意识的生物，具有解释并赋予事物以意义的能力，能依据意义来组织自己的行为。在关于社会性质的假设上，是“社会唯实论”与“社会唯名论”<sup>③</sup>之争。在前者看来，社会本身是一个超越个人的客观实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有机整体大于其组成部分之和，其特征区别于并且不可还原于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个体。与此相反，社会唯名论者则强调，只有个人才最终是客观实在的，社会仅仅是用来称谓一群人的名称，是个人及其行为的一种组合。可以说，西方社会学中各种不同的理论差不多都是根据这些假设的不同组合而建立起来的。这些关于人和社会的假设可以有四种不同的基本组合，从而有四类不同的理论。

其一，“社会唯实论”和人的“自然主义”假设的组合，不妨称之为“自然主义的社会唯实论”。基于这两种假设建立起来的理论主要有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迪尔凯姆是持这一套假设的典型代表，他在《规则》中说到，社会学“所要求的一切，即是将因果性原则运用于社会现象。……既然因果规律在自然的王国中得到证实……我们便可以说，在社会世界它同样是真实的。”<sup>④</sup>因此，“某个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从先于它的社会事实中去探求，而不是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中去探求。”<sup>⑤</sup>而社会事实在迪尔凯姆看来，根源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结构中。基于这样的假设，迪尔凯姆在他的理论中确立了整体分析优先，整体特征不能还原成它的个体部分特征的方法论原则。正是这一思想，奠定了当代功能主义的探讨方向。尽管功能主义有许多思想并非一致的代言人，但他们在关于人和社会的假设上是基本相同的，都继承了迪尔凯姆的思想传统。虽然冲突理论作为功能理论的一种反动，将分析的重点从社会的一致和秩序转到冲突和变迁上，但它同样强调优先分析外在于个人并对个人起支配和决定作用的社会结构，其理论中隐含着与功能理论相